

韩、日经济发展模式之比较

崔志鹰

内容提要：韩、日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四个共同点：政府都对经济进行干预，储蓄率较高，重视节能和环保，企业管理崇尚权威。本文着重对韩、日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点进行比较，指出韩国奉行“出口第一”，日本奉行“国内市场第一”；韩国以“大企业为主”，日本则“大企业 and 中小企业并举”；韩、日企业决策模式不同，韩国负债率和通货膨胀高于日本，经济稳定性不如日本，但韩国比日本更重视科技和人力资源的投资。

关键词： 韩国 日本 经济模式

韩国与日本都是东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尽管日本的经济基础要好于韩国，但韩国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创造了可与日本的“隅田川奇迹”相媲美的“汉江奇迹”，其经济发展的经验仍值得关注。本文拟对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些比较。

(一)

韩国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0年，韩国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美元。那时很少有观察家认为韩国贫困落后的经济能有希望得到改善。然而，从1963年起，韩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期，到1970年韩国达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1986年，伴随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的“三低”现象（低汇率、低利率、低油价），韩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韩国国内储蓄率首次超过投资率，国际收支也从长期的赤字转向了盈余。结果，韩国能迅速减少因接受发达国家援助而造成的巨额外债，实现了“经济独立”的早期目标。韩国经济进入了“依靠自身维持发展”的阶段。1986年，按照消费价格指数测算的韩国年度通货膨胀率稳定在2%—3%的水平。1986—198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每年超过12%，为当时全球最高的增长率。1995年，韩国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¹

¹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随着经济发展，韩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持续减少，而非农业——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增加。1960—2001年，农业产值占韩国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6·5%下降至4·4%，而非农业产值的比例从63·5%增加至95·6%，其中，工业产值占韩国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8·6%增加至41·4%。与此同时，韩国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扩大。1966—2000年，5名员工以上的韩国制造业企业从22718家增加至102924家。²由于制造业向城市地区集中，也加速了韩国的城市化发展。

韩国的发展模式不仅来源于韩国的产业发展战略，而且也来源于韩国各种经济政策的选择。韩国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韩国的高增长是由“出口扩大”带动的，并且是由出口产业迅速成长而支撑的。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朴正熙政府提出“出口第一主义”、“出口立国”等口号，并制定了各项政策积极鼓励韩国企业扩大出口。韩国出口企业的企业家们不仅在开发出口产业、扩大出口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而且政府对他们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充分肯定使他们得到了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满足。由于出口扩大几乎是被韩国政府“强力推动”的，因而韩国的出口产业和整个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以超常的能力得到了发展。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也面临崩溃的边缘。为挽救处于危机中的经济，日本吉田内阁于1946年2月制定了“倾斜生产方式”，即对物资、物价、资金、劳动等全面进行统制，优先发展煤炭、钢铁、化肥、海陆运输等产业，并带动其它产业，全面复兴日本经济。“倾斜生产方式”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它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鉴于此，日本政府继“倾斜生产方式”之后又推行了“产业合理化政策”，即微观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和宏观的产业结构政策。前者是旨在改善私人企业经营的措施，干预企业的经营细节，使企业得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然后全面推广。后者是根据国家利益对日本全国各产业的比重及个别产业内部的比重进行调整，如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和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之间的比重。³

1955年，日本经济得到了恢复，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产业有两个。一个是钢铁、石油；另一个是汽车、电视机、耐用消费材料，特别是汽车对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丰田汽车公司有一家高冈第二厂，生产“皇冠牌”汽车，除了供应日本本国市场外，也出口到美国。该厂两辆汽车生产的间隔时间只有五十秒钟，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83.

²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95.

³ 郑彭年：“日本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2期，第40页。

是世界上最快的汽车生产速度。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也与日本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要实现现代化的生产，电子计算机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日本的钢铁企业，完全是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不需要很多员工，工厂的劳动条件得到了完全改变。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跃居世界第二位。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仅次于美国，而且在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精尖加工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已位居世界前列。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了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优势产业格局。几十年来日本的制造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除家电外，日本的机床、工业机器人、半导体装置、锂电池、液晶显示器、CD—ROM等的销量迄今仍在世界市场上稳居第一。日本的汽车年产超过1000万辆，居世界首位。日本汽车业不仅成功地保持了世界一流的生产水平，而且在环保型汽车的开发方面遥遥领先。作为日本工业传统强项的家电业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可再生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家电已成为日本家电业的主力产品。⁴

（二）

综观韩、日两国的经济，可以发现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第一、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韩、日两国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比较明显。与西方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全相同，韩、日两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均起了主导作用。

从韩国经济运营的实际情况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为止，韩国政府都没有放弃在经济开发中的主导作用。为了保证政府的主导作用，韩国政府不仅规定了每个时期的经济开发方向，而且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例如，在金融方面，韩国政府不仅直接掌握韩国银行，而且没收所有民间银行的民间股份，将它们全部收为国有。在培育特定战略产业时，对于基干产业和主要社会间接资本几乎一律由政府规定投资目标，依靠财政融资及政策金融筹集投资资金，只让民间部门按价格机制运营。韩国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表现为资源配置上的两种调控方式。其一是直接调控，那就是政府以国营企业的方式建设基干产业(或重要产业或战略产业)和社会间接资本领域的大型项目；其二是间接诱导，那就是政府利用利率、汇率、税收、工资等价格变量，使投资资金流向由政府选定的特定部门，即由政府选定但由民间企业

⁴ 刘淑琪：“日本经济的竞争优势及形成机制”，《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48页。

承担的大型项目。⁵韩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和重化工业化政策就是韩国政府用政府主导型方式推进经济增长的两个典型实例。

上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提出了“产业合理化政策”。“产业合理化政策”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干预企业的具体措施和政府对本国全国产业的比例进行调整，也就是政府对市场机制作有计划的调节。这个政策当时没有被赋予具体的概念，迟至 1975 年才被日本通产省首次作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方式”提出来，成为日本新经济体制的概念。上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复兴期)开始确立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方式”，到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 70 年代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扩大。日本经济就是在这种自我调节机制不断完善和扩大之下向前发展的。⁶在日本，政府经常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甚至会派官员深入到企业参与企业高层的决策。

当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韩、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也逐渐由政府主导型转向了民间主导型。在经济开发的初期，在国内资源、资本、技术和经验都很缺乏的情况下，政府主导下的各种保护、支援政策较之以市场原理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更能有效地推进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但是，政府对民间企业活动的过度的保护、支援与管制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如阻碍民间企业的创造性活动，降低产业与企业的竞争力；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多样化，政府对民间部门经济活动的管理也达到了限界，甚至出现了政策失败。为纠正经济开发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副作用，需要将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营方式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缓解保护、支援与管制政策的约束，引进旨在搞活市场功能的竞争原理。⁷

第二、韩、日两国都强调国民要勤奋、节俭，因此韩、日两国的国民储蓄率一向较高，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韩国的家庭储蓄很有规模，几乎占到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30%。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1971—1980 年，韩国的储蓄率为 22·3%；1981—1990 年，韩国的储蓄率为 31·8%。⁸日本国民也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是最高。由日本家庭储蓄形成的投资约占其社会投资总额的 1/3。按照“平均消费倾向+平均储蓄倾向=100”的公式计算，2000 年，日本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为 27.9%。⁹

韩、日两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相当部分是靠内部积累，大规模的家庭储蓄被用于生产所需，这为韩、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保证，同时还积极引进外资来弥

⁵ 李景台：《产业政策的理论与现实》，韩国产业研究院，1991 年版，第 126—127 页。

⁶ 郑彭年：“日本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东北亚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40 页。

⁷ 朴昌根：《韩国产业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0 页。

⁸ 肖枫：“‘东亚发展模式’成功的秘诀及其面临的挑战”，《东北亚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9 页。

⁹ 见《中国日报》2007 年 4 月 10 日。

补其资金不足的部分。而且，韩、日两国引进外资的重点是外国直接投资，这与拉美国家国民储蓄率较低、引进的外资中有较多的商业贷款，其中不少还是流动性极强的短期资本（飞燕式资本）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韩、日两国的自然资源都较贫乏，因而两国在经济发展中都较重视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韩国是个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据统计，韩国人口接近 5000 万，但其国土面积却只有 9·92 万平方公里。在韩国，除了锰、高岭土、硅石等资源外，其它的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和燃料（包括原油等）基本上都要依靠从国外进口。¹⁰日本是个国土面积较小的岛国，国内资源也很贫乏，能源和矿产资源等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从外国输入的资源（即原油、天然气、煤、铁矿石、锰、镍、铝、铜、铅、锌、磷、钾等）每年增长 19%。¹¹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韩、日两国在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都下了大功夫。

在节能、环保、开发清洁能源等方面，日本不仅具有资金、石油运输、石油开采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且在成品油精炼、环保型能源技术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不断开发出思路奇巧、技艺精湛、轻便美观、节能高效的产品。目前日本钢铁厂的能源使用效率在全世界最高，日本汽车的节能优势也居世界前列。日本政府还致力于开发未来的数字化油田技术，并积极推动甲烷水合物的开发利用。韩国则致力于调整能源结构，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向“能源低消耗型”转变，并制订了“海外油田开发”和“替代能源开发”的能源发展两条腿战略。根据 2005 年的《替代能源开发及利用普及促进法》，韩国政府确定了太阳能、风能、地热、氢能源、潮汐等 11 个领域的替代能源开发项目，其中太阳能和风电项目是重点。¹²

第四、韩、日两国的企业管理均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崇尚权威与秩序，下级服从上级。如群体观念、服从意识和建功立业的精神等，这些文化因素往往激励着韩、日两国国民为各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进入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韩、日两国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意识，他们将自己所属的公司、集团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竭尽所能地为之服务。韩、日两国经常强调员工对企业（集团）的忠诚，反对任何叛离集团和个人孤立于集团的行为，这使韩、日两国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为增强，从而在韩、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与欧美国家的企业不同，韩、日两国企业都不大鼓励员工发挥个性和标新立异。

¹⁰ 李靖宇等：“韩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宏观测定”，《东北亚研究》1999 年第 3 期，第 30 页。

¹¹ 据《学术界动态》1979 年 6 月 29 日报道。

¹² 胡亮：“中日韩能源合作与‘东亚共同体’建设”，《东北亚学刊》2007 年第 4 期，第 57 页。

较强的“群体”观念使韩、日两国国民普遍有求同和从众的心理，他们喜欢“随大流”，即“别人怎样，我也怎样”，甚至有点儿“盲从”，比较缺乏个人的“求异”和“创新”。他们重共性，集团意识强，善于群体生活。“集团生活需要和谐和共性，更多是强调相同，而不是强调个性和自我，要达到真正的和谐有时要求牺牲人的个性，这样容易盲从，没有是非。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容易受别人和媒体的左右，而少有自己的真正看法。”¹³这种状况往往使韩、日两国企业的创新精神不足。

(三)

韩、日两国经济发展模式除了上述几个共同点外，还有以下几点不同。

1、韩国奉行“出口第一”，而日本则奉行“国内市场第一”。在韩国政府“出口第一”的口号和大力推动下，很多韩国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使许多韩国企业是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其国内市场的需求来生产产品。例如彩色电视机行业，1980年以前，彩电在韩国国内是不允许被销售的，这样韩国的彩电企业必须将它们的产品在海外市场上出售。其它还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留声机、手机、貂皮大衣等也是这样。

相反，日本企业通常则是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来生产产品。带动绝大多数日本企业发展的，是日本的国内市场而不是海外的国际市场。日本国内市场与韩国相比相对较大，日本有一亿多需求旺盛、购买力较强的国民，这样使几个大企业生产同类的商品也有其发展的空间。日本文化的一元化现象造成日本人“一窝蜂”的购物倾向严重，而且消费者往往以最新款式显示其身份地位，这使得一些新产品一经问世，便会很快形成较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由于日本企业生产的新产品大都先在日本国内市场销售，从而使日本国内市场往往成为新产品能否在海外的其它国家市场生存的试金石。¹⁴任何在日本国内市场上能与其它企业成功竞争的日本企业也一定能在海外的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而韩国“出口第一”的产业发展战略正好与日本“国内市场第一”的产业发展战略相反。

2、韩国经济以“大企业为主”，而日本经济则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并举”。由于韩国产业能力的扩大是通过现有企业的扩大，而不是通过新企业的创立来实现的。这种发展模式持续了20多年，这既导致了韩国大企业的数量较少，又造成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差距的扩大。韩国政府过多将国家资源集中投向大企业，影响了韩国中小企业的顺利发展，造成

¹³ 何德功：“从生死观历史观看中日文化差异”，《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5日。

¹⁴ 刘淑琪：“日本经济的竞争优势及形成机制”，《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50—51页。

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和不合理。韩国的市场集中率要比日本高得多。相反，日本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因此，韩国的经济通常被称作“大企业经济”，而日本的经济则被称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经济”。

3、韩国大企业的负债率高于日本的大企业。由于奉行“出口第一”的韩国许多企业的发展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动”的性质，因而制造业占韩国 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日本。而且，韩国从农业向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换也比日本更快。

由于产业扩张能力过快，韩国国内的投资额往往超过其国内的储蓄额。而且，韩国国内的许多储蓄实际上又被用来抵消通货膨胀。结果，韩国国内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只好用外国贷款来填补。1985 年以前，随着韩国进口石油和工业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大，韩国的外债数量持续上升。这样，外国资本流入韩国的数量比日本高。而且，被政府“强力推动”扩大生产和出口能力的韩国大企业的负债率往往也比日本的大企业要高。

4、韩、日两国企业的决策模式不同。韩国企业大多是家族式经营，这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少弊端。有利的方面是，韩国企业保留的由儒学所倡导的、建立在“上下有序”的人与人关系基础上的“家长制”文化，它强调结果，强调绝对尊崇等级序列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一个负责、稳定和高效率的领导班子，领导者的决策可以很快转化为员工的实际行动，避免了许多单位内部及部门之间常见的争权夺利、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损公肥私的现象。但这种家族式经营的体制也有不少弊端，最主要的是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缺乏科学决策。在韩国企业集团内部，大多不允许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进行合理的讨论。企业的发展命运往往取决于“家族”少数人的决策。一旦决策失误，企业的利益就会受到重大损失，甚至导致企业倒闭。

日本企业决策的权力和责任模式则不同。日本企业内成员轮流从事不同的工作，在广泛的范围内积累经验，协调工作。个人的责任和权力较不明确，决定通常是集体做出，有时候甚至看不出谁是真正的决策人，因此当企业组织出现问题时也很难找出真正的责任担当者。日本企业通常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议，通过“合意”做出决定。有的参加会议的人与所要讨论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决定通常有几个人做出。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决策的过程较长，但好处是，决定一旦做出，实行起来较顺利。¹⁵

5、韩国经济的稳定性不如日本。由于韩国奉行“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其经济的稳定性相对较差。1955—1970 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日本赶上了大多数欧

¹⁵ 孙丽：“传统文化与公司治理：中日韩企业模式的比较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5 页。

洲工业化国家，到 1970 年日本达到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水平。韩国的高增长从 1963 年持续到 1995 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比日本长。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5—1999 年韩国平均每年的人均 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 6·6%，为这一时期世界上最高，远远超过了日本同期 3·4%。¹⁶ 尽管韩国经济总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日本，但韩国经济却经历了周期性的波动。例如，1966 年韩国经济增长率是 12·7%，但第二年，1967 年就下降到 6·6%；1969 年又上升到 13·8%，随后 1970 年再下降到 7·6%。¹⁷ 由于上世纪 70 年代韩国经济的规模比较小，因而其增长率大幅波动主要是受到大型投资项目在紧缩阶段时的影响。另外，外向型的韩国经济也极易受到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和其它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上世纪 60 年代时韩国经济决策者的缺乏经验，也是经济出现波动的一个因素。迅速但明显出现波动式的增长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1980 年韩国经济的高增长曾出现了“暴跌”现象，主要是由于 1979 年韩国朴正熙总统的被刺杀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的混乱。那年韩国经济出现了一 4·8% 的增长，再加上农业收成不好、世界石油价格上升使经济情况变得更糟。除了 1980 年韩国经济出现负增长以外，1965—1999 年韩国经济虽有较大波动，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超过了 5%，超过了日本同期的经济增长率。¹⁸ 韩国经济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但相比之下，日本的经济发展仍走在韩国前面，主要原因是除了日本在一些领域的技术比韩国先进以外，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基本上没有出现“暴跌”的现象，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平稳。

6、韩国的通货膨胀比日本严重。据 1997 年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报告”称，韩国已经成为高收入的国家，因此世界银行也将韩国列为发达国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劳动力的收入比例提高得不快，日本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低，而且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但在韩国，劳动力的收入比例明显得到了提高。这也许是由于韩国拿薪水的员工和职业管理者的绝对数迅速增加。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韩国的管理阶层人数很少且收入很差，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他们的收入也持续提高。

1985 年以前，韩国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国际收支的赤字，这部分原因是由于韩国资源的贫乏，但主要是由于允许出口企业为生产出口商品而大量进口原材料、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

¹⁶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108.

¹⁷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88.

¹⁸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108.

政策。由于出口企业为扩大生产总是想尽可能多地进口，所以韩国的进口量增长很快。但从1986年起，韩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盈余，韩国从“一个年轻的负债国”转变为“一个成熟的负债国”。

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伴随着逐渐地、缓慢地通货膨胀。但在韩国，经济增长则带来批发和消费价格快速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这在经济遭受石油价格上升、农业收成不好、政府变更以及其它因素打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983年以前，韩国经济可以描述为“高增长、高波动、高通胀”。“高通胀”主要是由于韩国出口和产业能力超常地、被政府“强力推动”迅速扩大所带来的各方面需求的过分膨胀。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观察，韩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究竟有哪些联系还不是很清楚。以韩国的经验看，尽管存在着“高通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还是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观察，通货膨胀多少给债权人、储蓄者、固定收入者和领取养老金者的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韩国大多数职工是储蓄者，因而他们都受到了快速通货膨胀的伤害。

另外，资本系数，即投入资本占产值的比例，或者说是每一单位产值所需要的投入资本额，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仍保持较低的水平。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之一。但在韩国，资本系数则上升较快。这也意味着韩国经济发展投入的成本较高，其收获的效益不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在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过多投资以及受到1980年韩国经济“暴跌”的影响，韩国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缓慢，造成了资本系数上升。而1989年以后，韩国资本系数迅速上升则主要是由于韩国企业为支付员工高工资、职业培训和更换设备所进行的大量投资。韩国员工工资迅速提高开始于1987年，因为那年6月29日韩国开始了民主化运动。民主化运动使企业员工的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大幅提高，但相应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7、经济增长初期韩国用于社会发展的投资较小，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迟于日本。由于韩国政府的政策优惠向出口和制造业的发展倾斜，而资金的来源有限，再加上韩国的国防支出相对较高，因而用于韩国社会发展的投资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策优惠，由此造成用于韩国社会发展的投资往往低于用于韩国生产活动的投资。

由韩国政府推动的工业化导致了韩国人口和企业在大城市、尤其是在首尔地区的过分集中。韩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超过了日本。1960—2000年，韩国居住在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人口比例从28.5%上升至89.7%。如今，超过90%以上的韩国人生活在大、中城市。

¹⁹但由此带来的住房紧张、教育设施紧缺、公共服务差等城市问题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也成为韩国严重的国内问题。

除非韩国的企业家和商人纷纷抱怨韩国社会的基础设施问题严重，韩国政府在发展运输、通讯、电力、供水和排污等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行动一般都比较迟缓的。因此，韩国产业的前期发展往往面临着航空、电话、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的短缺。例如，韩国的金浦国际机场远比日本东京的机场小得多。又如，由于电话线和交换机的短缺，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韩国要装部电话需要花几千美元。然而，1988 年汉城奥运会和 2002 年世界杯足球赛后，韩国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扩大。目前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很可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机场。

8、韩国比日本更重视科技和人力资源的投资。在科技方面，由于韩国比较重视通过科技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科技人员在韩国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而日本虽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科技人员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始终不高，这造成了许多日本的科技人员向国外流出的现象。日本的科技人员向国外流出的现象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韩国的三星电子等公司用各种手段，多方网罗日本的科技人员，从而造成了韩国三星电子公司的销售额直线上升、而日本同类厂家却日益衰落的结果。²⁰

另外，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广泛投资，这对韩国的迅速现代化是极为有利的。韩国在教育领域的公共和私人的投资通常超过GNP(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个百分点，在发展中国家中最高。²¹韩国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比例，现在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

(四)

不少韩国人和外国人都曾估算韩国大约比日本落后多少年，他们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即韩国对外开放贸易要比日本晚 20 多年；韩国 1988 年举办奥运会要比日本 1964 年举办奥运会迟 24 年。由此，很多韩国经济学家根据相关的经济资料分析后认为，韩国有可能比日本落后大约 20—25 年。²²

¹⁹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95.

²⁰ 据日本《钻石》周刊 2008 年 8 月 30 日报道。

²¹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88.

²² (韩) Byu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韩国与日本的经济起步时间不同，产业结构处于梯度层次，互补性较强。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需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韩国抓住了机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使经济迅速跃上了一个台阶。由此可见，韩、日两国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依次传递转移，可不断提高两国的产业层次，促进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韩、日两国经济都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和新的挑战。随着美国次级房屋贷款不良影响而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以及全球油价上涨等原因，使世界经济的前景显得很不明朗。投资的减少、经济的低增长率、国民收入差别悬殊、人口老化、未来劳动力人力资源下降等问题，使韩、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韩、日两国经济发展要走出困境，“跃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在于要确立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韩、日两国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在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韩、日经济要实现又一次新的腾飞，应当转型为以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全面推进知识、信息、技术导向型的产业化，即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方面的创新，同时还需要对金融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进行改革。

当前，韩、日两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变化。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具体情况和条件，都有各自的特色和利弊所在，因此不能简单地来评论哪种模式孰好孰坏。未来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取得新的成功，尚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以及是否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学习和借鉴韩、日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些成功经验，避免韩、日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犯过的一些错误，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更平稳、更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作者系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 魏全平）